

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

陈国威

(广东湛江教育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37)

摘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慈善观应是他丰富的思想体系的一环, 他倡导的种种慈善之举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郑观应; 慈善观;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05)03-0103-03

郑观应(1842—1922年), 本名官应, 字正翔, 号陶斋, 别号待鹤山人, 或罗浮待鹤山人, 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人(今中山市)。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纵观郑氏的一生, 他不仅从事于商业、外交等方面的工作, 而且也有过主持过各省赈务, 从事过社会保障救济工作的经历。而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却大部分限于其商战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教育思想、人才观等, 而他的慈善观罕见地缺乏研究。事实上, 郑观应的慈善观应是他丰富思想体系的一环, 对他的慈善观的研究, 是有助于全面了解他的思想体系的。

慈善, 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许慎在《说文解字》注“慈”只二字“爱也”。而《北史·崔光传》则记: “光宽和慈善, 不忤于物, 进退沈浮, 自得而已。”在此之前, 《韩非子·内储》有曰: “王曰, 慈惠, 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 用比较直接又通俗的话说就是: “以慈行善”。而按西方学者的说法则是: “慈善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1]而慈善观则是指一种“恩被于物、慈爱于人”、“老其老、慈其幼, 长其孤”的拯救世道人心的观念^[2]。

郑观应曾回忆说: “官应年十七, 小试不售, 即奉严命, 赴沪学贾。”^[3]说明了他从贾之前曾在科举之路走过, 说明了他儒家知识分子之一

员。事实上, 他是出身于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他的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封建文人; 他的父亲郑文瑞虽终身未取功名, 但仍是“夙承家学, 读书过目成诵, 藏书颇富, 手自校讎, 丹铅殆遍”的“设账授徒”的乡村塾师。因而若说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兼济思想对其有所影响, 是不足为怪的。同时, 由于他长时间厕身于洋行, 长期活动于上海等沿海开放地区, 故西方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综观郑观应的一生, 他的慈善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传统的善恶报应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尚书·商书·伊训》中说: “惟上帝无常,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周易·坤·文言》中则谓: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而自佛教东渐后, 因果报应说, 在中国大地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慈善”一词更在中国得到广泛使用。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自佛教中国化以来更是中国民间的普遍信念。郑观应传承这个传统, 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观念劝人为善。在《救时揭要·救济速报》中, 郑观应借范仲淹对其子之语: “余居官仁慈, 德至尔相。今凶年饥馑, 国家之事, 莫大于恤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济”, 来宣扬慈

* 收稿日期: 2004-12-20

作者简介: 陈国威(1968—), 男, 广东湛江人, 广东湛江教育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文化史。

善行为。他认为:“救济之功可以赞化育,救济之事可以参天地”,世间大富大贵之家,“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只有人们行善事,是会有好报的。而在《救时揭要·论医院医家亟宜考究》中,他以所知一件事说明了为善之好。顺德陈乃济医师因平时为善,致使阴间也助他长寿、家世兴隆^[4]。在《富贵源头》序中,他把救人于危难视为人生第一大福,说:“福者何?无所不备之谓也。救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饥。”^[5]毕竟“夫降灾自天,而弭灾则在人。”(《救时揭要·论救水灾》)

(二)救济与保障并重

19 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可谓动荡不靖,天灾与人祸,促使民生日艰。面对世态民瘼,一些有识之士深表怜悯和同情,遂以救人济世为怀,纷纷投入到社会慈善救济中。郑观应就是其中一位。1878 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灾荒严重,郑观应与江浙仕绅盛宣怀、经元善、严作霖、谢家福等人,在沪上设筹赈公所,筹捐赈济晋、豫、直、陕等省灾民,并将其母陈氏遗留下来的一千两银子也捐纳了。正是由于郑氏的乐善好施行径,清政府不仅授予他道员衔,且准许他在家乡香山树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并将有关人员的姓名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3]。正是在这些实践中,郑观应发展、丰富、充实了自己的慈善观,认为官府不仅要联合各省富绅合资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性的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无赖乞人”,而且还要培养被收养者自食其力,不要让他们不劳而获!“或使之耕,或教以织。虽跛脚,盲目、亦有所司,称其力之相宜,俾令自食其力”^[4]。也就是说,郑观应的社会救济不是单纯的经济救助,而且还要在政府干预下的“自食其力”。在社会问题日趋突出之时,政府不仅要带头联系或“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设立社会救济保障基金,设使“城市乡落遍立善堂”,为贫困者“施医药、棺木,或设义冢、学堂。如有水旱荒灾,集资放赈而已”,还要在善堂里设立工厂,收养贫寒子女^[5]。即仿效西方各国设立工艺院,教育贫民子女成就一艺,以便他们能在世间营生。“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

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4]。只有这样的“培植”,才能“化莠为良”,才能“一举而数善备”;正所谓“授以一艺,则国无游民”^[4],才能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在这里,郑观应将救济与保障并列而施,无疑更具近代意义,更具社会政治理念。夏东元先生曾称郑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本家”^[6],在笔者看来,称郑氏为一位更具参与社会、改造社会意识的社会实践家也未尝不可。

(三)推崇西方慈善事业,希望以西方为鉴

17 岁就因“小试不售”而“服贾”到上海洋行学习商务的郑观应,已有二十余年的买办生涯了。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是比较熟悉的,正如他所言:“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4]。对西方慈善事业他也毫不例外,给予很大的关注。同时更主张对西方实行“拿来主义”。在他著名的政论《盛世危言》一书中,他特辟“善举”一节,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立、种类以及在社会上的作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养老院、老儒会,绣花会、童艺院、保良会、疯人院劝世会、义学会、恤贫会等等,“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正是因为西方“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故“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4]。在郑观应看来,正是由于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使得社会上乞丐和盗贼大大减少,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保障。这种“立法綦密”的西方社会慈善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毕竟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所缺陷的,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还没有树立起来。如他批评耗资万千的“神会梨园风俗”,“耗此费者,年中不知几许。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认为为什么不“使省梨园神会之资,改作济世救民之事”?^[4]这难道不是一件更好的善事吗?因此郑观应呼吁官方应大力提倡实政,而绅商殷户们则应有好善之德,造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社

会风气,培养一个人人有爱心的社会基础,以此创造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里,更显郑氏是一位改良主义思想家,也反映他的兼容并收的开放思想。

(四)关注女性

众所周知,慈善事业的主要方向是关注弱势群体。而在中国,由于封建思想的流毒,妇女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综观历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妇女都是最大的受害者,致使女性可谓是弱势群体中的弱者。在慈善观里,郑观应也给予女性应有的重视。在他较早的政论著作里,就对当时整个社会漠视女性的生存权的社会现象给予猛烈的抨击。如他在《救时揭要·劝戒溺女》中认为“溺女一事,罪孽甚大”,人们要注意因果报应。“凡溺女者以故杀子孙论。纵不畏冥诛,岂不畏显戮耶?”毕竟“天地好生,万物并育。一虫一蚁尚欲贪生,一草一木尚求滋长”,何况人呢?要知道“王法或可幸逃,天网岂可漏哉?”^[4]而在慈善救济事业方面,郑观应要求应给予女性特有的关注。因为在他看来,性别比例的平衡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性别比例的失衡,将会导致社会婚配困难,“流民既无系恋犯法之事,何惮不为?”^[5]这将给社会造成无穷的祸患。尤其在灾荒年间,妇女更是处于无助的地位。如光绪年间,河南发生灾荒,乡间妇女就被鬻卖一空。故此,郑观应主张,在灾荒

期间,应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为了遏止鬻卖妇女的风潮,在发放赈米时,应考虑对妇女加倍赈给;政府则要在交通要地设立关卡,截留送还被鬻卖的妇女,以杜绝贩卖之源。这也同时显示了郑氏超乎时人的人口意识。

从总体上看,作为脱胎于封建文人而又处于近代时期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位思想家,郑观应的慈善观难免有不尽完美以及缺陷之处,但却充溢着一股浓郁的近代气息,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发展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愿望,是与他“富强救国”的理念相吻合的,无疑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剂苦口良药;他提出的一些颇具近代色彩的慈善措施,对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改良与发展,无疑是达到振弊起盛之作用。

参考文献:

- [1]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2] 周秋光. 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3]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4] 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上册[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5] 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下册[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6] 夏东元.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Exploration on Zheng Guanying's Concept of Beneficence

CHEN Guo-wei

(Zhanjiang Education College, Zhanjiang 524037,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is an early bourgeois reformist thinker of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modern Chinese thinker's circle. The concept of beneficence should be a side of idea system. He suggested varied philanthropy, which was important in his age and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concept of beneficence; value